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

米歇・傅寇

陳志梧　譯

*Michel Foucault(1986) "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Spring): 22-7.〔法文原出自 Foucault 的演講 "Des Espaces Autres"(1967). 後來刊於 1984 年的法國期刊*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e*上〕。

19世紀最重要的著魔(obsession)，一如我們所知，乃是歷史：以它不同主題的發展與中止、危機與循環，以過去不斷累積的主題，以逝者的優勢和威脅著世界的凍結。19世紀把它本質神話的根源，建立在熱力學第二原理上。而當今的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在同時性的時代中(epoch of simultaneity)：處在一個並列的年代，近與遠、肩比肩、以及星羅散佈的年代。我確信，我們處在這麼一刻，其中由時間以一生發展出來的世界經驗，遠少於連繫著不同點與交叉間之混亂網絡所形成的世界經驗。或許我們可以說：特定意識形態的衝突，推動了當前時間之虔誠繼承者與被空間決定之居民的兩極化對峙。結構主義，或至少被分在此略嫌泛稱下的學派，是在連到時間軸之不同元素間，建立一個關係整體的努力，以使它們呈現並列、彼此對立、相互糾結——簡言之，使它們呈現一種形構(configuration)。事實上，結構主義並未低貶時間；它的確包涵了一個處理我們稱之爲時間及歷史的特定方法。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空間在當今構成了我們關心、理論和體系的範圍，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在西方的經驗中，空間本身有它的歷史，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時間與空間不可避免的交叉。在空間史的粗略回顧下，我們可以說，中世紀時存在著一種層級性的地點整體：神聖地點與凡俗地點；圍護地點與開放、暴露地點；城市地點與鄉村地點（所有這些都牽涉了人們的生活）。在當時宇宙論的理論中，有一超天國地點相對於天國，依次，天國地點又相對於現世地點。在某些地點裡，事物被暴力移換安置；而在其相對的地點裡，事物有它的自然基礎(natural ground)和穩定性。就是這個完整的層級、對立與地點的交錯，構成了可泛稱爲中世紀空間的定位空間(space of emplacement)。

這個定位空間被伽利略打破。伽利略的成就引起的眞正憤怒，不全然在於他地球繞日的發現（或再發現），而在於他對一個無限的，而且無限地開放的空間建構。在這個空間中，中世紀的地點瓦解了，因爲某物的地點，除了只是它移動中的一點外，再也沒有任何意義，

就如事物之穩定性，只是它移動的無限減慢吧了。換句話說，從伽利略以及17世紀起，延伸(extension)取代了地方化(localization)。

今天，基地(site)又取代了本來替代了定位的延伸。基地被兩點或兩元素間的近似關係所界定；從形式上，我們可將這種關係區分成序列的、樹狀的與格子的關係。總之，在當代的技術工作中，基地作爲問題的重要性是衆所周知的，例如：機器記憶之資料及直接計算結果的儲存，零散輸出之非相關元素的流通（汽車交通乃一單純的案例，更確切的是電話線中的聲音傳送）；對一組零散分佈之符號化或密碼化元素的指認，或根據單一或多重分類來排列。

在一個更具體的方法上，人類配佈(siting)與安置的問題發生在人口方面。人類基地或生活空間的問題，不僅是了解這個世界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的問題——這顯然是個重要問題——而且也是在一個既定情境中，了解人類元素之近親關係、儲存、流動、製造與分類，以達成既定目標的問題。我們的世代是空間帶給我們的，是基地間的不同關係形成的世代。

從各方面看，我確信：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係，比之與時間的關係更甚。時間對我們而言，可能只是許多個元素散佈在空間中的不同分派運作之一。

當今，雖有各種占有空間的技術，雖有可劃定和形式化(formalize)空間的知識網絡，當代的空間仍未全然地被俗化(desanctified)（它看來與時間不同，可當成從19世紀的神聖中抽離出來）。可確定的是，雖然有某些理論上的空間俗化發生（如伽利略作品所指出者），但仍未到達實際空間俗化之際。並且，或許我們的生活仍被一些特定的、無法破除的對立所統治，它們仍然未被我們的制度與實踐摧毀。這些我們認爲單純的、既定的對立是：例如，私密空間對公共空間；家庭空間對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對有用空間(useful space)；休閒空間對工作空間。凡此種種，都仍被隱然存在的神聖化(sacred)所滋養。

巴希拉(Barchelard)的偉大作品〔譯註：指的是《空間詩學》〕

與現象學式的描述教導我們：吾人並非生活在一個均質的和空洞的空間中，相反的，卻生活在全然地浸淫著品質與奇想的世界裡。我們的基本知覺空間、夢想空間和激情空間本身，仍緊握著本體的品質：那或是一個亮麗的、清輕的、明晰的空間；或再度地，是一個暗晦的、粗糙的、煩擾的空間；或是一個在上的巔峰空間，或相反的是一個在下的泥濁空間；或再度地，是一個像湧泉般流動的空間，或是一個像石頭或水晶般固定的、凝結的空間。然而，這些分析雖然根本地反應了我們的時代，但主要卻涉及內部空間。現在，我希望討論一些外部空間。

我們所居住的空間，把我們從自身中抽出，我們生命、時代與歷史的融蝕均在其中發生，這個緊抓著我們的空間，本身也是異質的。換句話說，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吾人得以安置個體與事物的虛空 (void) 中，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被光線變幻之陰影渲染的虛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組關係中，這些關係描繪了不同的基地，而它們不能彼此化約，更絕對不能相互疊合。

當然，我們可試著找尋某組界定特定基地的關係，以描述這些不同基地。例如，描述那組界定運輸、街道、火車等基地的關係（火車是這些關係的異常包裝，因爲它是那個跑動的東西，它同時是從一個點跑到另一個點的工具，並且又是一個跑走的東西）。我們可以經由一組可被界定的關係，來描述暫時休憩的基地——咖啡座、電影院、海灘等。同樣地，我們可以經由關係網絡，來描述封閉與半封閉的休息基地——住屋、臥室、床等等。但是，在所有基地中，我對某些特定基地與其他基地相關的奇妙特性感興趣，然而，是在一種懷疑、中性化、或倒轉這組作爲指示、照見及反映的關係的方式下感興趣。這些空間，一如過往，與所有其他空間關連，同時和其他基地矛盾，它們有兩個主要的類型。

首先，有一類是虛構地點〔烏托邦〕(utopia)。虛構地點是那些沒有眞實地點的基地。它們是那些與社會的眞實空間，有一個直接或倒轉類比之普遍關係的基地。它們或以一個完美的形式呈現社會本身，或將社會倒轉，但無論如何，虛構地點是一個非眞實空間。

同時，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著另一種眞實空間——它們確實存在，並且形成社會的眞正基礎——它們是那些對立基地 (counter-sites)，是一種有效制定的虛構地點，於其中眞實基地與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眞實基地，被同時地再現、對立與倒轉。這類地點是在所有地點之外，縱然如此，卻仍然可以指出它們在現實中的位置。由於這些地點絕對地異於所有它們的反映與討論的基地，並因它們與虛構地點的差別，我稱之爲差異地點 (heterotopias)。我相信在虛構地點與這些截然不同的基地，即這些差異地點之間，可能有某種混合的、交匯的經驗，可作爲一面鏡子。總之，這片鏡子由於是個無地點的地方，故爲一個虛構地點。在此鏡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於其中的自我，處在那打開表層的、不眞實的虛像空間中；我就在那兒，那兒卻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種讓我看見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處，看見自身：這是一種鏡子的虛構地點。但就此鏡子確實存在於現實中而言，又是一個差異地點，它運用了某種對我所處位置的抵制。從鏡子的角度，我發現了我於我所在之處的缺席，因爲我在那兒看到了自己。從這個凝視起，就如它朝我而來，從一個虛像空間的狀態，亦即從鏡面之彼端，我因之回到自我本身；我再度地開始凝視我自己，並且在我所在之處重構自我。這個鏡子，在下述的角度有一差異地點的作用：當我凝視鏡中的我時，那瞬間，它使我所在之處成爲絕對眞實，並且和周遭所有的空間相連，同時又絕對不眞實，因爲，爲了感知它，就必須穿透存在於那裡面的這種虛像空間。

對於這樣的差異地點，又應如何描述呢？它們到底有何意義？我們可以想像某種有系統的描述——我並不是說一個科學，這個詞目前過於令人震驚——這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可以成爲研究對象，分析、描述與「閱讀」這種差異空間，或這種不同空間。作爲我們生活空間的某種並存之神話與眞實的論爭，這種描述可稱爲差異地學

(heterotopology)，它的第一原則是：或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文化不建構差異地點。這對任何人類群體都是不變的。但是差異地點明顯地有相當不同的形式，同時，或許不可能找到差異地點的絕對普遍形式。無論如何，我們可將它們分成兩個主要範疇。

在所謂的原始社會中，有一種差異地點的特定形式，我稱之爲危機差異地點(crisis heterotopia)，就是一些特權的、神聖的、或禁限的地點，保留給某些相對於他們範圍之社會、或人類環境而言，處在一種危機狀態(a state of crisis)的個體，如：青春期男女，月事期婦女，懷孕婦女，老人等。在我們的社會中，這種差異地點正逐漸地消失，不過仍可找到一些殘存物。例如：寄宿學校的19世紀的形式，或年輕男性的服兵役等，在在扮演著這種角色，事實上男性生殖能力的初試啼聲，被假設應在家以外的「別處」發生。對女孩而言，一直到20世紀中葉，仍有一個叫「蜜月旅行」的傳統，這是由上古遺傳下來的主題。年輕女性的落紅，只能在「無處」(nowhere)發生，並且，當它在火車上或蜜月旅舍發生的那一刻，的確是在這種無處的地點裡，這種差異地點沒有任何地理標記。

但是今天，這種危機差異地點正逐漸消失，我相信，取代的是所謂的偏離差異地點(heterotopia of deviation)：以安置那些偏離了必備之中庸和規範的人們。這種案例有療養院(rest homes)、精神病院，以及監獄等；同時，我們可能應再加上養老院，因爲它介於危機差異地點與偏離差異地點之間，總之，因爲老年是一個危機，同時也是一種偏離，在我們的社會中，休閒有一定規定，老滯是一種偏離。

這種差異地點描述的第二原則是：每一個社會，就如它的歷史所展現的，可使既存的差異地點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運作：因爲每個社會中，各種差異地點都有它精確而特定的功能，而且，相同的差異地點，會根據它所在之文化的共時性，而有這種或那種作用。

我將舉墓園這個奇特的差異地點爲例來說明。墓園當然是個有別於一般文化空間的地點。總之，這是一個與城邦、社會、或村落等基

地有關的空間，因爲每一個體，每一家庭都有親屬長眠於此。在西方文化中，墓園一直實際地存在。但是它卻歷經一個重大的轉變。直到18世紀末葉，墓園都一直被安置在城市中心，緊臨教堂。墓園中有一個未來墳墓(possible tombs)的層級關係。其間有一個無主屍體的停屍間，有一些個別的墳墓，有一些在教堂內的墳墓。後者本身有兩個類型，或僅爲一塊銘文的墓碑；或爲有雕像的陵寢。這種安置在教堂之神聖空間內的墓地，在現代文明中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轉向，而且奇妙地，就如某些人殘酷地指出，在一個「無神論的」時代中，西方文化建立了所謂的死亡儀式(the cult of dead)。

基本上，這是非常自然的，在一個眞正信仰著肉體復活與靈魂不散的時代裡，對肉體之存留不會賦予太多重要性。相反地，自從人們再也不確定將有一個靈魂與肉體再生的那一刻起，反而必須更重視屍體，因爲它是我們存在於人世和語言中的最後僅存的痕跡。從各方面來看，自19世紀初葉起，每一個人對她（他）自己的過逝，有權擁有一個小盒子；但是同時，也就是從19世紀初葉起，墓園開始被放置在城市邊界之外。與死亡之個體化和布爾喬亞對墓園佔用平行的是，死亡被當成「病癮」的著迷的昇起。死亡被設想成替生存帶來了病禍，同時，死亡出現在緊臨著住屋邊、教堂旁和幾乎在大街中，就是這種臨近性傳達了死亡本身。病癮的主題經由墓園和傳染病而散播，持續到19世紀末葉，一直到19世紀，才開始把墓園移到郊區。此時，墓園不再是城市神聖和不朽的中心，而變成了「另一種城市」，在此每一個家庭擁有它暗晦的長眠處所。

第三原則：差異地點可在一單獨地點中，並列數個彼此矛盾的空間與基地。因之，劇院在長形的舞台上，可一個接一個地引入一系列彼此無關的地點；因之，電影院是一個奇怪的長形房間，在一端的二度銀幕上，我們看到一個三度空間的投影。但是或許花園是這些差異地點中最古老，並且是一個矛盾形式基地的例證。我們不應忘記，在東方，花園是個有上千年歷史且令人驚奇的創造，它有許多極深沉而

看來疊合的意義。波斯的傳統花園是一個神聖化空間，被表徵著世界四大區的園內四份長方形空間匯集起來，是一個比其他部份更神聖化的空間，就如一個臍點(umbilicus)，世界的肚臍就在花園的中心（噴泉和水池就在其上）；而且園中的所有植物，都被設想成聚集到這個空間、這個微宇宙中。就如地毯，它們原本是花園的複製(reproduction)（花園是一個地毯，於其中全世界齊集以表達它的完美，而地毯是一種可在空間中移動的花園）。花園是世界的最小包裹，並且它也是世界的整體性。從古代起，花園就是一種快樂的、普同化的差異地點（今天我們的動物園就是來自這個源頭）。

第四原則：差異地點通常與時間之片刻相關——這也就是說它們對所謂的（爲對稱之故）差異時間(heterochronies)展開。當人們到達一種對傳統時間的絕對劃分時，差異地點才開始全力作用。這種情境顯示：對個體而言，當墓園開始了這種奇怪的差異時間，生命的喪失，以及它在城市中心的經常基地開始消失瓦解，而準永恒性昇起的一刻，墓園才眞正地成爲高度的差異地點。

從一個普遍的觀點來看，在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中，差異地點與差異時間是在一個相對複雜的方式下被結構與分派。首先，有些無限累積時間的差異地點，如博物館和圖書館。在博物館和圖書館所形成的差異地點中，時間從未中止於高築它的巔峰，在17世紀，甚至17世紀末，博物館與圖書館都仍僅是個人抉擇的表現而已。相反的，累積各種東西，建立一個普遍檔案的想法；把所有時光、世代、形式、品味封閉在一個地點的意志；在時間之外，建構一個不被破壞之全部時代地點的想法；一種在不變地點上，組織某種持續、無限之時間積累的計畫；這整套觀念是屬於當代的看法。博物館與圖書館對應於19世紀的西方文化而成爲差異地點。

相對於這些與時間積累有關的差異地點，尚有那些以其最瞬間的、轉換的、不定的時間對應，以一種節慶方式與時間關連的差異地點。這些差異地點，不是指向永恒，反而是絕對瞬時的(chroniques)。例如：

遊樂場，這些城市邊緣的美妙空曠基地(empty site)，每年一度或兩度地排出攤位、展覽、畸型物、角力、蛇女、相命等等。最近，又創造了一種新的瞬時差異地點：渡假村，如那些提供城市居民一個三週密集的原始與永恒赤裸的波里尼西亞村落。你可進一步地看到兩種差異地點的形式在此會合，節慶差異地點與積累時間的永恒差異地點，德傑巴(Djerba)的茅舍，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博物館和圖書館，爲了再度找到波里尼西亞生活而棄置時間，然而這個經驗又等同於時間之再發現，就好似整個人類歷史回到它的起點，而可用某種直接知識接近之。

第五原則：差異地點經常預設一個開關系統，以隔離或使它們變成可以進入。一般來說，差異基地並不像公共地點般可自由進入。或許進入是強制的，如軍營或監獄，或許進入的個體必須被奉獻到儀式或淨化。爲了進入，我們必須有一定的許可，並作出某種姿態。更有甚者，甚至有些差異地點完全獻身於淨化活動——淨化一部份是宗教的，一部份是衛生的，如：回教的過火人，或其他純衛生的淨化，如斯堪地那維亞的三溫暖。

有些差異地點看來好似有全然單純地開放，但是它們通常仍隱藏了奇怪的排他性。認爲任何人都可進入這些差異基地，只不過是一個錯覺吧了：我們認爲進入了我們身在之處，但是就進入的事實來看，卻被排斥了。我想到的例子是巴西或南美洲大農場中那些著名的臥室，這些房間的入口，並不通往那些農場家庭生活的中心房間，而每一個來此的人或遊客都可打開此門進入，並在此過夜。但是這些臥室的使用者，從不能進入這些家庭的空間；來訪者絕對只是變換中的客人，而非眞正的受邀訪客。這種類型的差異地點，實際上正從我們的文明中消失，或許仍可在著名的美國汽車旅館中找到，那是男人開車帶他的情婦去的地方，那是被禁止的性行爲被絕對包庇、絕對隱匿、保持孤立，而不允許開放的地方。

差異地點的最後特徵，是它們對於其他所有空間有一個功能。這

個功能開展了兩種極端：一方面，它們的角色，或許是創造一個幻想空間，以揭露所有的眞實空間（即在其中人類生活被區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覺的（或許，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所扮演的當今我們被奪取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反地，它們的角色是創造一個不同的空間，另一個完美的、拘謹的、仔細安排的眞實空間，以顯現我們的空間是污穢的、病態的和混亂的。後一類型並非幻像，而是補償性差異地點，並且我懷疑有那個殖民地不扮演這個角色。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它們在全球空間的一般組織層面上，扮演著差異地點的角色。我想，比如，17世紀第一波殖民運動，英國人在美洲建立的清教徒社會，即是絕對完美的不同空間。我也認爲在南美建立的那些不凡的耶穌會殖民區：美妙的、絕對節制的殖民區，於其間人類的完美被有效的達成。巴拉圭(Paraguay)耶穌會所建立的殖民區中，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節制。村落根據一個嚴格的配置，環繞著一長方形地點排列。其底端是教堂，一邊是學校；另一邊是墓園；而在教堂之前有一條大道與另一條直角相交；每一個家庭有一個小屋沿著這兩條軸線而建，因此，基督的符號被準確的複製。基督教精神將美洲世界的空間和地理刻劃上它根本的符號。節制個人日常生活的不是口哨，而是鐘聲。每個人在同一刻被叫醒，同一刻上工，正午和五點鐘進食；而後上床，而在午夜時開始所謂的性的覺起(marital wake-up)，在教堂鐘鳴下，每個人進行她／他的責任。

妓院和殖民區是差異地點的兩個極端類型，而且我們最後認爲：船是一個浮遊的空間片斷，是一個沒有地點的地方，以其自身存在，自我封閉，同時又被賦予大海的無限性，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一個航向到另一個航向，從一個妓院到另一個妓院，它們遠航到殖民地，找尋奇珍異寶以展現在花園中，你應可以了解爲何船對我們的文明而言，不只是自16世紀以來的重要經濟發展工具而已（此點我今天未提起），它同時擁有最重要的想像。船隻是差異地點的 par excellence（極致範例）。若文明中無船，則夢幻枯絕，間諜活動取代

探險，而警察取代海盜。